

不知道这十大谜案,就别说读懂了钱锺书



(接上一期)
第三:钱锺书真的是攀权附势之徒吗?

我先讲两件事情。
第一件,是作家罗银胜的一个叙述:1946年,钱锺书任《书林季刊》主编时,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,有一次汇报,要参加一个晚宴。

这个晚宴很特别,因为“极峰”(蒋介石)要来。所以大家都抢着要去参加,但钱锺书却老身溜回家了。

第二件,是画家黄永玉的叙述:“文革”期间,上面通知钱先生参加国宴。一般人接到通知,都高兴得屁颠屁颠的。钱先生却说:“我很忙,我不去哈!”“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去的!”“哈!我不去,我很忙,我不去!”“那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,起不来?”“不不不!我身体很好!我很忙,我不去,哈!”

从这两件小事便可窥斑见豹,说钱锺书攀权附势,实在牵强。那钱锺书为何没被打成右派呢?

钱锺书,字默存。
默存,出自《汉书·扬雄传》之“默默者存”。

何为“默默者存”?
就是少说话,默无言,才能避灾免祸,得以长久生存。

默存,就是钱锺书的生活哲学。所以,钱锺书特别注意三件事。

第一:对政治保持沉默。“一旦牵涉政治,就三缄其口。”他一生只钻学问,不问政治。

第二:远离权力中心。“不攀附,不站队,躲进小楼成一统。”

第三:尽量不见人、不社交。“平生素不喜通声气,广交游。”正因为这三点,很多人觉得钱锺书狂。

钱锺书说:“人谓我狂,不知我之实猖。”

狷,出自孔子《论语》,引申为“洁身自好,性情耿直”。

洁身自好、洁身守志,乃钱锺书一生的行为准则。正因如此,他才没留下什么“重要把柄”。

有人说:钱锺书怎么不是右派啊?杨绛回答道:凭什么钱锺书就该是右派?你把我打成右派,总得有把柄吧,但钱锺书的底子确实非常“干净”。

没被打成右派,并不意味着没挨整。

钱锺书夫妇最终还是被污蔑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被扇耳光,被剃阴阳头,被挂牌子游街,被众人批斗,被下放干校劳改,被弄去扫厕所,女婿王德一也被逼自杀。

有人说钱锺书攀权附势,真攀权附势,怎会有此“待遇”?

在刀光剑影的“文革”动荡中,我非常佩服钱锺书的三种活法。

第一:有恃于内,无待于外。
连哲学家李慎之都万分佩服这一点:“学部猛斗牛鬼蛇神,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,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,胸前挂着打有大x的大牌子昂首阔步,从贡院前街走回胡同宿舍里,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,既不畏缩,也不惶悚。这只有‘有恃于内,无待于外’的人才能做得到。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,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。”

第二:决不出卖任何人。
文革时,知识分子面临的状况,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。你选择揭发别人,你就有可能脱罪,别人若不揭发你,他就可能面临重罚。所以大家都互相检举互相揭发,一大批专家学者就这样倒下了。

但钱锺书总是紧闭嘴巴,绝不卖出任何人。顾准有句名言:“我的手上没有血。”

五六十年代,敢说这话的知识分子,找不出来几人,但钱锺书算一个。

第三:超然于事外。
文革里,钱锺书夫妇所在单位被连锅端,全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“劳动改造”。

大家要么唉声叹气,要么放任自流。

唯独钱锺书夫妇是个例外,他俩竟然能够超然物外,不受干扰,一如既往地醉心于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钱锺书劳动完就看书,写他的

《管锥编》。
杨绛劳动完就看书,翻译她的《堂吉珂德》。施武文有句话说得特好:“他们家对外界纷乱,似乎有种过滤功能,无论外面多么动荡,他们都能不受干扰,一如既往地醉心于他们想做的事情。”

待文革结束时,钱锺书完成了文艺史上著名的《管锥编》,杨绛完成了《堂吉珂德》最好的中译本,这个中译本,后被邓小平当作国礼,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。真是佩服钱锺书夫妇超然于事外的能力。还是李慎之说得对:有恃于内,无待于外。

谜案7:钱锺书的清高是精心制造出来的吗?

大家都知道钱锺书清高,尤其是1990年《围城》热播之后,他更是闭门谢客,不见外人。并由此诞生了那句名言: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,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?”

所以大家都更觉得他清高了。但近十年,有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:钱锺书的清高都是精心制造出来的。“钱锺书一生都在演戏,装清高、装隐士、装君子,仿佛不食人间烟火,实际很世故,是个沽名钓誉之徒。”

这个观点,赢得了很多点赞。但真是如此吗?

我先来讲几件事情。
很多人都不知道,钱锺书只有学士学位。

当时留学欧洲,获得学士学位之后,只要再吃两年饭,就可以获得硕士。再吃四年饭,就可以获得博士。很多留学生就是这样混到了高学历。

所以陈寅恪说:“吾留学生中,十之八九,在此所学,盖惟欺世盗名而已。”但钱锺书并没有这么做,他取得牛津学士学位后,立马又赶去巴黎大学求学。

他跟陈寅恪一样,只求学问,不求学历。所以,他一辈子都只是学士学位。

1981年,普林斯顿大学欲授其博士学位,但被钱锺书拒绝了。

几年后,哈佛大学寄来通知,让其赴美接受博士头衔,钱锺书没有理睬,哈佛以为他没路费,汇来三千美金,但被钱锺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。

1991年,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,要联合拍摄《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》,钱锺书为首批36人之一,每个“受拍名人”会得到一大笔钱。

但这次拍摄被钱锺书拒绝了。

1996年,无锡欲筹建钱锺书纪念馆,但被钱锺书严辞拒绝。同年,钱锺书被中国文联授予景泰蓝装金质奖章,当时钱锺书正缠绵于病榻,奖章送来后,他一言不发。

只将双目一闭,表示拒绝。

2000年,享有“名人堂”之誉的中国现代文学馆,欲将钱锺书纳入其中。但被杨绛拒绝了:“锺书说过,他不愿进中国现代文学馆,也不想置身大师之林。”所以,说钱锺书沽名钓誉,实在牵强。

有人说:他就是这么会演啊。

那我只能说一句:能一辈子演成这样,那也很牛啊。

很多人说钱锺书很世故。
钱锺书当然很懂“人情世故”,看看《围城》,就知道他多了解人情世故。

但是“了解世故”和“做人世故”是两回事。

在谜案6,黄永玉讲了一个“我不去”故事。

现在,我再讲一个易中天讲的:大年初二,一权威人士来钱家拜年,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,把人家挡在门外:“谢谢!我很忙!我很忙!谢谢!”这就是钱锺书——知世故而不世故。《菜根谭》里有这样一句话:“势利纷华,不近者为洁,近之而不染者尤洁;智械机巧,不知者为高,知之而不用者尤高。”

然也。
谜案8:钱锺书是不是仗势打林非?

这是近十年最热的一个悬案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:1999年12月20日,《鲁迅研究月刊》刊发

一篇文章《林非被打真相》,这篇文章是针对11月19日《南方周末》刊发的杨绛的文章《从“掺沙子”到“流亡”》。

意在说明杨绛“胡编乱造,毁林非夫妇声誉”。

杨绛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?主要写了两件事情。

第一件:房子被“革命群众”分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期间,有一项革命措施,让‘革命群众’住进‘资产阶级权威’家里去。”

据我后来得知,这叫“掺沙子”……

钱锺书夫妇及女儿钱瑗夫妇原有四间房,1969年,被林非夫妇分去两间。

第二件:与林非夫妇发生了打架纠纷。

杨绛说1972年他们从五七干校回家后,“掺入了我家的‘革命男女’,还在‘继续革命’,我们忍耐再忍耐。”

但终于有一天,他俩火山爆发了。“星期日,大家的休息日。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。

革命女子也要她洗,并且定要先为她洗。

钱瑗说,小陈是我家约来的。革命女子对钱瑗说:你不是好人!

随手就打她一耳光。

我出于母亲的本能,立即冲上去还手。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,把我提起来,又摔下,又提起,又摔下。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,自知力弱不胜力。

就捉住嘴边一个指头,按入口内,咬一口。

………

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,把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。

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。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,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。”

这就是杨绛一文描述的大概情况。林非看到杨绛这篇文章后很生气,便在自家刊物《鲁迅研究月刊》上,刊发了妻子肖凤写的《林非被打真相》一文,以公布“事情的真正的真相”。

这篇文章主要说了两件事情。

第一:我和林非不是“沙子”。

“1968年春天,我怀孕了。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‘革委会’主任的文学批评家,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,我们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。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,他就动了恻隐之心。因此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。”

第二:真正被打的是我和林非。

“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,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,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,时间很紧张,让余嫂赶快洗起来。

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,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,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了,为什么要如此着急,于是就争论起来了。

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,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住我的脸庞,用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,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。

………

我疼痛得大叫起来,林非从房间里奔了出来,想要解救我。

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,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,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。”

这就是肖凤一文描述的大概情况。接着,林非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说明,在《黄河》上发表了《必要的澄清和说明》,在《散文百家》上发表了《我被钱锺书殴打的前后经过》,在《书屋》上发表了《致书屋编辑部的一封信》。

这些文章旨在证明杨绛“胡说八道”,而真正受害的是我“林非和肖凤”。

这些文章发表后,被多家报刊转载,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,很多人感叹:“没想到钱锺书夫妇竟这样刻薄。”“没想到钱锺书夫妇竟这么伪善。”

这个事情“真相”到底如何,只

有当事双方才知道。

在这里我只说几个小疑问。
第一:这个事情是杨绛挑起的吗?

林非夫妇撰写的多篇文章,都是针对杨绛《从“掺沙子”到“流亡”》一文,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是杨绛挑起的。

真是如此吗。
其实一查就知道,在杨绛写此文之前,林非夫妇已然在书及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。

一篇是肖凤写的《回眸·林非被打》,一篇是林非写的《小灾小难》。

我们来看看《小灾小难》是怎么写的:“他的女婿被学校里定成‘反党反社会主义’的‘516分子’,他就整天咒骂这正倒霉的小辈。驸马爷觉得走投无路,竟刚烈地悬在树上自杀了。

………

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,我们都看在眼里,却从来不敢流露自己的想法,更不敢去议论和打扰。

可是他的态度却大大地改变了,当我们经过他的门口时,他竟一丝不挂地坐着,还念念有词,骂骂咧咧。

有一天早晨,他竟抡起棍棒,直往我妻子的头顶挥去。”

读林非这篇文章,我有三个疑问。

第一:林非说钱锺书女婿,是不堪钱锺书咒骂而上吊自杀的。

其实一查钱锺书履历和档案就知道,钱锺书1969年就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,直到1972年3月才返回北京。

而王德一自杀的时间是1970年,说他不堪钱锺书整天咒骂而自杀,显然无法成立。

第二:钱锺书是精神病人吗?“他竟一丝不挂地坐着,还念念有词,骂骂咧咧。”说得钱锺书就像精神病人一样,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荒唐。

第三:事情的起因有点自相矛盾。“有一天早晨,他竟抡起棍棒,直往我妻子的头顶挥去。”

这句描写,更显得钱锺书神叨叨了。

但这个“钱锺书莫名其妙就打人”,与后来解释的“洗衣事件打人”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?或许正因如此,杨绛才写了《从“掺沙子”到“流亡”》一文。她说:“被逼而写的文章。”钱锺书究竟打人没?

毫无疑问,是打了。

但是不是莫名其妙打人以及所谓仗势欺人,我觉得值得商榷。

很多人不知道,“打架纠纷”的最终结果是:钱锺书一家搬离了这套房子,住进了女儿所在北师大的一间学生宿舍。

谜案9:钱锺书到底配不配称大师?

很多人觉得钱锺书不配称大师。因为钱锺书是有学问,但没有创见,所以不能称为大师。

王朔:钱锺书是个“立体书橱”,只会背死书。

老侠:钱锺书是有学问,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。

苏小和:钱锺书不能算思想家,因为他没建立思想体系。

钱锺书真的没有思想吗?
你知道哈佛大学出版社是怎样评价《管锥编》的吗?

它说“《管锥编》著作体例古今未有”:

“这是本世纪关于古代中国问题的,最有洞察力和最包罗万象的著作,是研究中西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。”世界最著名的英语出版商企鹅出版集团,其“企鹅经典”文库,在2000年之前只收入了两个中国作家的书。一个是鲁迅,另一个就是钱锺书。显然,钱锺书并非没有思想。

那钱锺书为何容易被人视为“没有创见”呢?

这和钱锺书的治学方法有关,因为他根本不屑于像其他人一样创建体系:“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,都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,在整体上都垮塌了,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,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。

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,住不得人,也唬不得人了,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。整个理论系统剩下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。”所以钱锺书并不想建立什么思想体系,而只想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精妙见解。

这些见解并不是杂乱无章的,都服务于一个“特定问题”,即求证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;南学北学,道术未裂”。

为了求证与解决这个“特定问题”,钱锺书不仅打通了古今,也打通了中西与打通了西西,用文艺评论的方式给出了分析与答案。

与钱锺书类似的还有著名文学理论家哈利·莱文。

莱文是哈佛大学教比较文学的顶级教授。

记者朱虹在《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》中写道:上世纪80年代,莱文赴华讲学,访问了钱锺书,告别出来后,莱文教授坐在车里一路闷闷的,快到宾馆了,他突然冒出一句:“我自惭形秽!”

我问:“为什么?”

他说:“我所知道的一切,他都在行。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,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!”他那口气,透着无限的遗憾。

很多人觉得钱锺书不是思想家,但他自有他的粉丝和知音。学者贺卫方有句话说得妙:“有人把钱锺书先生不是思想家,那不过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类型的思想家而已。”

谜案10:钱锺书晚年为何没有大作品?

蔡康永写张爱玲时,有段话说得很有意思:“拿所有三十年代作家来,放在张爱玲的身边,立刻分晓:白话文有白话文的土,文艺腔有文艺腔的土,左派左派土、右派右派土,一个不是青筋暴露,就是灰头土脸。

唯一不土的是钱锺书,可他写一写又不写了。”

其实,钱锺书不是不写了,《围城》出版后,他并不满意。他在1980版《围城》“重印前记”写道:“我写完《围城》,就对它很不满意。”

于是,他决定再写一本小说。

“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,命名《百合心》。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。一九四九年夏天,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,手忙脚乱中,把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。”

钱锺书后来想重写时,不料反右、文革等动荡发生了。待一切结束时,以前的构思却早已遗忘:“事隔三十余年,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。”这部《百合心》就这样胎死腹中了。“假如《百合心》写得成,它会比《围城》好一点。”钱老说。

真是一个天大的遗憾。

钱锺书想写的并不只是《百合心》。

1978年,他在给郑朝宗的信中说:“假我年寿,尚思续论《全唐文》《少陵》《昌黎》《庄子》等十种。”

最惊人的是他想写另一部“管锥编”,现存的《管锥编》,是联系世界文学来商讨与映照中国经典准则。另一部“管锥编”,是用英文写一部评述西方文学的论著,是对照中国文学来商讨与映照西方经典准则。这部大书,先是被动荡耽搁了。动荡结束后,因为爱惜自己的作品,他又花费数年修改了《管锥编》《谈艺录》。

八九十年代,钱锺书被媒体炒得火热,于是国内外朋友、学者常来信求教与问候,钱锺书被迫不得不回信答复。杨绛说:“他晚年平均一天要回三封信。”

钱锺书感叹:“我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。”写作计划,就因这些原因而搁浅了。

至于他,是一声叹息。

而于中国文学史,却是一个大遗憾。1998年12月19日,钱锺书撒手西去。

他死后,著名学者余英时这样写道:“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,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。”钱锺书并非完人,但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读书人。